

区域经济增长的制度思考

——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

李南菲, 孙斌栋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 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台州经济快速增长的分析, 提出制度是台州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决定性要素的假设, 并通过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该假设进行了验证, 旨在探究“台州现象”背后的原因。定性研究以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的定义为基础, 其结论支持了本文的假设。定量研究采用了单一指标即非国有经济比重来量化制度, 建立了关于经济发展与制度、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回归模型。定量研究的结果显示, 资本而非制度是台州经济快速增长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最后对定量验证的结果进行了解释和分析, 认为就台州而言, 制度虽不是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因素, 但也不可否认其重要作用。

关键词: 制度; 台州现象;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TU 984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在这当中, 浙江台州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最为迅速且最具自身特色的地区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 台州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地区, 在浙江省各地市中其GDP总量仅处中游水平。而由于人口众多, 其人均GDP仅处浙江省末位, 是典型的不发达地区。

近三十年来, 台州民营经济快速增长, 工业化程度迅速提高, 并形成以塑料、机电、医药化工等九大支柱产业为主、行业分布广泛的地方工业体系, 社会福利水平显著提高。仅2002年, 台州就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3.4%的增速名列浙江省首位。2003年, 台州的人均收入水平跻身浙江省人均收入第二, 全国人均收入前十名。台州不再是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洼地”, 而发展成为继杭州、宁波、温州后的浙江又一大城市(图1、2)。2005年4月, 台州市被正式接纳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 当年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列长三角地区第一位。在浙江省经济高于全国水平的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2008年台州市在省内各地市中, 人均GDP排名向前增加了三位, 更有进一步超越其他城市的势头。

2009年, 台州全市实现生产总值2025.47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 比上年增长8.5%。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5148元, 比上年增长7.6%, 按年平均汇率折算, 人均生产总值已达5145美元^①。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标准, 台州市已进入到上中等收入水平。

收稿日期: 2010-12-0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0971103)

作者简介: 李南菲(1985-), 女(汉族), 浙江丽水人,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图 1 1978 年浙江省各市人均 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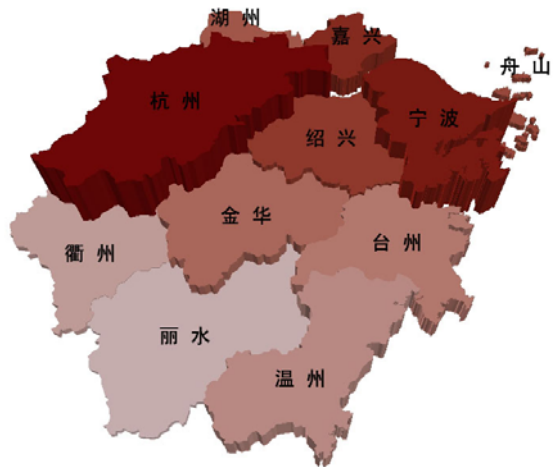


图 2 2008 年浙江省各市人均 GDP

然而，台州市的自身经济发展条件并不优越，甚至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它地处浙江省中部沿海地区，偏居一隅，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交通闭塞。自然资源稀缺，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其区位偏离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经济辐射圈，承接不到经济中心的扩散和较大的外贸投资。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港湾，改革开放初期却因多方面限制无法开发利用。因地处海防前线，国家投资少，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很少得到上级政府的直接投资和政策扶持，如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中就没有台州。

面对这样的经济发展条件，面对着改革开放以来台州经济的蓬勃发展，自然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如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台州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2 假设的提出

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而新经济增长理论则强调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视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认为制度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另一个要素，在某些处于制度变迁的区域，制度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台州是股份制经济的发源地，是中国当前两大经济模式之一的“温台模式”的创始者，其制度变迁与经济实践的丰富实践为制度分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基于此，本文以制度变迁的视角提出假设，即制度在台州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并在此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验证，以探寻促使台州经济发展的关键原因。

3 假设的定性验证

North 认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人们制定的规范相互交往的准则^[1]。制度可以分为非正式约束和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是指形式上没有正式规定的游戏规则，包括习惯、行为准则、风俗和意识形态等。正式约束是人类设计和制定出来的规则，包括政治（和法律）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在当今现代经济中非正式制度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1]。正式制度的确立，又提高了非正式约束的效力，规范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而解决复杂的问题。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本文将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两方面进行定性验证。

3.1 正式制度验证

正式制度是经过正式描述和书写下来的规章，主要用于解决复杂交换所产生的纠纷^[2]。

台州的正式制度可以分为地方和全国两个层次,包括由台州所制定的制度及由国家所公布的制度。

台州地方层次的正式制度主要是对应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的情况和特点而制定的。

改革开放之前,台州的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因地方政府控制的资源少,台州政府主要是通过相应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释放各种生产要素,以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1978-79年,台州相继建立起社队企业管理局,制定了企业发展规划。在这些着眼于发展集体经济性质的政策在各级政府执行中,并没有过多地强调和限制各类经济主体的性质,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制度环境的松动^[3]。1980-82年,台州地方政府对国营企业与城镇集体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83-84年逐步在台州所有国营企业中全面实行利改税。这些制度的实施,有效的释放了各种生产要素,从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力的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台州是中国股份合作制的发源地。台州政府通过发展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大推动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可以用几个重要的时点事件来考量:1982年6月,原温岭县工商局突破禁区,给牧南工艺品厂等4家企业发“联户企业”执照,这是我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雏形;1984年8月台州地方政府召开了千人乡镇企业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台州经济要翻两番,乡镇企业挑重担”、“台州人民要致富,乡镇企业找出路”的发展战略,区域内民营经济得以迅速兴起;1986年10月,原黄岩县委、县政府印发了《关于合股企业和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意见》,极大地增进了民营企业成长;1987年10月,在国家改革出现反复的情况下,台州提出了“取两南(苏南、浙南)之长,走自己的路,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的战略,并实行了相配套的税收、贷款、工商登记等一系列政策,进一步增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4]。从中可以看出,台州的制度创新与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是政府与民间互动共同推进的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国家走出了改革开发的第一步,相继出台了相关法规政策,为台州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前提和政策环境。例如,国家1984年的“一号文件”已经明确允许农村资金自由流动和鼓励农民以股份式合作的方式创办企业,并允许私人企业雇工超过8人,从而开始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无论是台州本身发展中生产要素的释放,或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前提下,台州发展历程证明,本文的假设中正式制度的作用是成立的。

3.2 非正式制度验证

非正式制度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被明确的写下来,但对人的行为影响很大。台州资源贫瘠,交通闭塞,受资源禀赋的束缚和靠山临海的地理位置的影响,台州人形成了敢于竞争的硬气和趋利求变的灵气,从而使台州人具有义利并重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开拓进取、独立自主、敢于竞争的精神^[5]。这种人力资本禀赋使得台州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获得先发优势。其中,经商能力使台州人较早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通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更加容易的接受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较早的顺应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其相较于全国大多数地区,优先创造了良好市场条件,弥补了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严重不足。数据显示,台州民营企业产值年均增幅44.7%,1984—1988、1991—1995近十年间,高达30%—110%^[6]。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假设中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是成立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制度因素(正式和非正式)在台州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

4 假设的定量验证

上节的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台州的制度变迁在其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更加深入的探究制度台州经济发展与其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我们将采用1985年到2008年台州经济发展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4.1 检验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以下使用的方法是简单相关分析和一元回归分析，借助 SPSS 软件（Windows 16.0 版）完成。经济增长速度，用人均 GDP 的增长率来量化。由于台州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归功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所以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对于 1985 年以来台州的制度变迁具有高度代表性。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反映非国有经济比重变化的指标采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变化（后一年比重减前一年比重），差值越大，表示改革越快，反之亦然。所用数据均来自台州市统计局。

简单相关分析的结果如下：

表 1 经济增长与制度的相关分析（SPSS 16.0）

		非国有经济比重增长率	人均 GDP 增长率
非国有经济比重增长率	Pearson Correlation	1	.329
	Sig. (2-tailed)		.135
人均 GDP 增长率	Pearson Correlation	.329	1
	Sig. (2-tailed)	.135	

R=0.329 Sig. t=0.135（双尾检验）

相关分析中，R 在 0.3 附近，显著水平仅 86.5%，表明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变化与人均生产总值的真实增长率相关性较弱。以人均生产总值的真实增长率作为因变量，非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作为自变量，所对应的一元回归分析结果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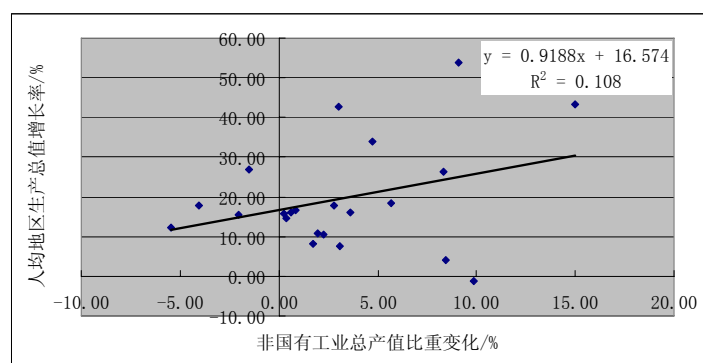


图 3 台州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比重变化的一元回归分析

4.2 在多因素存在的条件下检验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1) 计算结果

为了进一步检验制度与台州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下利用方程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多元回归是一元回归的深化，目的是在其他因素存在的条件下检验台州经济发展与其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其中，因变量为人均生产总值真实增长率，自变量除了制度之外，还包

括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

多元回归方程具体化处理后如下所示：

$$Y_t^* = a + b_1 I_t^* + b_2 H_t^* + b_3 K_t^* + b_4 L_t^*$$

式中各变量所采用的具体指标如下：

- Y_t^* 代表经济增长率；以人均 GDP 年增长率度量；
- I_t^* 代表制度变化；以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变化度量；
- H_t^* 代表人力资本增长率；以专利通过审核数增长率度量；
- K_t^* 代表资本增长率；以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度量；
- L_t^* 代表劳动力增长率。以从业人口数增长率度量。

该方程式所表达的意义是，经济增长率是资本增长率、人力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和制度变化的加权平均数。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表 2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5.999	4.573		1.312	.207
K*%	32.788	10.126	.595	3.238	.005
H*%	-3.848	8.265	-.071	-.466	.647
I*%	.592	.554	.212	1.068	.301
L*%	322.721	183.951	.322	1.754	.097

a. Dependent Variable: Y*%

以经济增长率作为因变量 Y，其他变量作为自变量 Xi（共计 4 个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enter）分析后，得到表 4。可以看出，资本自变量（ K_t^* ）的标准化系数的值最大，并且其显著水平也最高。这说明，在模型中，资本而非制度是台州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表 3 解释度

Model	R	R Square	Adjusted R Square	Durbin-Watson
1	.789	.623	.534	1.767

a. Predictors: (Constant), L*%, H*%, K*%, I*%

b. Dependent Variable: Y*%

Adjusted R Square 即修正 R^2 ，与变量数目无关，它能够确切的反映出拟合度。由表 3 中的修正 R^2 和 R^2 可以看出，最终得到的方程其拟合度较好。

(2) 经典线性回归假设的检验

① 多重共线性

表 4 多重共线性检验

Model	Collinearity Statistics	
	Tolerance	VIF
(Constant)		
K*%	.658	1.521
H*%	.950	1.052
I*%	.565	1.770
L*%	.658	1.521

a. Dependent Variable: Y*%

从表 4 可以看出，方差膨胀因子 VIF 并不大，表明上述回归方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② 异方差性

Scatterpl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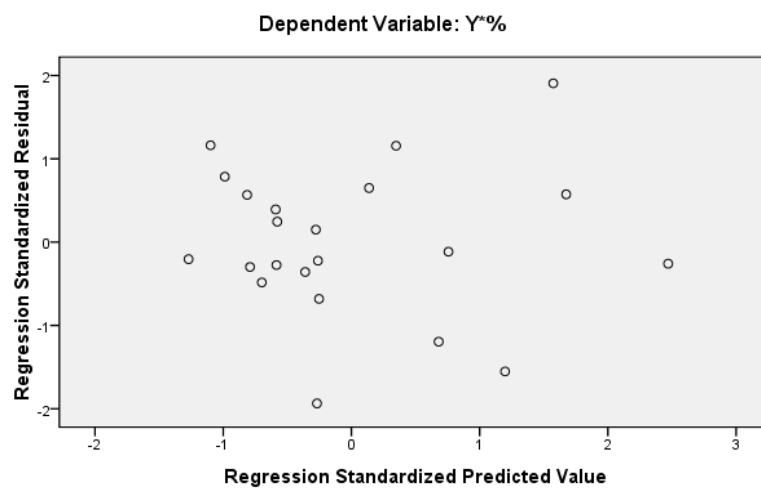


图 4 异方差检验

从图4中可以看出,通过对残差序列分析实现异方差检验,统计结果表明残差序列的分布形态不存在明显相关性,表明回归方程通过了异方差检验。

③ 自相关性

22 个样本和 4 个解释变量的 Durbin/Watson 检验结果 (95% 的显著水平) 如下:

$$d_L = 0.96; \quad d_U = 1.80$$

DW 统计量的值 $d = 1.767$, 小于 d_U , 检验无确定结果。虽然 d 值落在不确定区域, 但已经非常接近 d_U , 表明回归分析已接近不存在自相关性的区域。

如上所述,多元回归分析通过了异方差、多重共线等经典线性回归假设的检验,自相关检验无结果但非常接近检验通过区域。这说明回归分析的结果是可靠的。

5 定量检验的结果解释

5.1 关于制度不是台州经济发展最重要因素的解释

表 5 显示了台州地区 1986 年~2007 年的人均生产总值的真实增长率和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在 1993~1994 年之前,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变化与人均生产总值的真实增长率步调基本一致。但是,自 1994 年以后,台州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开始不显著。在模型中即表示,民营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减弱。1997 年经济增长速度更是降低到 5.36%。此后几年增长速度虽有所回升,但大体上还是处于全省的中游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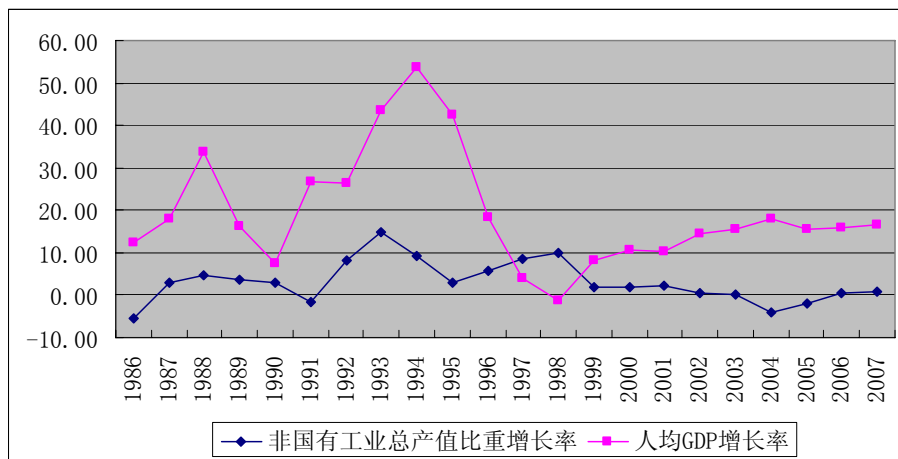


表5 台州市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率和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变化 (1986-2007年)

究其原因,造成模型中制度因素不显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民营机制优势消退

改革开放以来,台州经济快速扩张主要是靠民营企业的优势,但随着企业转制在全国各地普遍推开,台州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也逐步消退,也即制度变迁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逐步消退。这也解释了在跨度为 22 年的样本统计中,制度因素不显著的原因。

(2) 模型中制度因素的量化选择有一定的缺陷

制度的度量是一个及其困难且非常前沿的课题,还不存在普遍接受的方法。采用单一指标,如本文所用的非国有经济比重的优点在于数据易得且较为客观。但是有时不能完整的反映制度变迁所包含和涉及的各个方面及领域。所以,上述模型中仅以非国有经济比重

来代表制度变迁是不完整的,特别是在台州这样一个历史上受计划经济影响较弱,国有企业少的地区。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初,其非国有经济就有一定的发展,或者说是民间有很强的发展的愿望,所以制度改革对其的影响并没有对上海等地区的明显。

(3) 撤地建市的特殊背景

台州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挤占了工业用地指标。台州在1994年撤地建市之前是地级市,且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市中心”。1994年台州撤地建市后,选定发展较好的黄岩、椒江和路桥为其市区并改设为“区”,中心城市得到快速发展。10多年来台州经济开发区30平方公里的土地,绝大部分用于商品住宅建设及公用设施方面。这在当前农转非土地指标受控的情况下,也就意味着挤占工业用地指标。由于这层特殊背景,也让模型的度量存在一定的偏差。

因此,我们并不能仅仅由于上述定量检验的结果而否认制度变迁在台州经济快速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在90年代中期之前台州人均GDP增长率和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比重增长率的相关走势中就可以看出(表5)。

5.2 关于资本因素是台州经济发展最重要因素的解释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资本的显著性最高,其标准系数的值也最大。这表明在模型中,资本因素对台州经济发展贡献度最高。其原因有二:

(1) 台州经济发展方式属粗放型增长

台州的支柱型产业为:电力能源、汽摩配件、医药化工、家用电器、塑料模具等。这当中大多数是资源、资金密集型行业,经济增长还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和资本投入。这也同时解释了模型中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因素不显著的原因。

(2) 模型中资本的量化有一定的缺陷

资本应以固定资产总额来度量更为妥当。而本文考虑到数据可得性,资本的量化是以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值作为依据的,因此所建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从而造成模型结果一定的偏差。

参考文献

- [1] North D C. Institutionen, institutioneller Wandel und Wirtschaftsleistung [M]. 1992, 3, 56, 47~48.
- [2] 孙斌栋. 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 [M]. 科学出版社, 2007: 75.
- [3] 史晋川, 钱滔. 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市场增进论视角对浙江台州的历史考察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4, (2): 28~29.
- [4] 史晋川, 钱滔. 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市场增进论视角对浙江台州的历史考察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4, (2): 30.
- [5] 汪小倩. 山魂海魄是台州民营经济迅速崛起的文化基因 [J]. 台州学院学报, 2006, (4): 28.
- [6] 史晋川, 吴晓露. 禀赋约束与制度演进视角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11): 38.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 case study of Taizhou

Li Nan-fei¹, Sun Bin-dong¹

(1.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y of Taizhou has gained rapidly growth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Basing o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we propose the hypothesis that institution is the most decisive factor in Taizhou's economic growth, aiming at finding the reason behind the "Taizhou phenomenon". This hypothesis is verified through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way. The conclusion of the qualitative study,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of institution giving by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While the quantitative study used a single index (the proportion of non-state-owned economy) to quantify the institution and established a regress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nstitutional, capital, labor and human capita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apital rather than the institution is the most decisive factor in Taizh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study and draw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s to Taizhou, though the institution is not the most decisive factor in its economic growth, its important role cannot be denied.

Key words: institution; Taizhou phenomenon; economic growth